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 理论旅行及其引发的理论问题

曾 军 汪一辰

【作者简介】曾军、汪一辰，上海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20.5.104~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项目编号:16ZDA194)的阶段
性成果。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参与、持续对话的“西方同行”(Western Contemporaries)，^①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这一接受过程大约发端于1930年代的译介，并在新中国初期形成较大规模，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形成热潮。中西之间的学术旅行是一种双向的过程，既包括“西学东渐”，也包括“中学西传”。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原属于中西各自思想文化土壤而产生出来的问题，通过旅行、移植、接受而内化为新的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问题时，不能简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纯粹的“外在的他者”，而应该视为“内化的他者”。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中国问题的。正如刘康所言，“‘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是外在的(extraneous, extrinsic)，也是内在的(immanent, intrinsic)。西方理论相对中国而言是外在的。但成为中国的问题后，即经过中国的转换、变异之后，就成了中国学术与思想史的内在问题”。^②本文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即1949-1965年前后)的接受情况做一个考察，看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了哪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理论在与“中国问题”的交会中是如何被阐释(乃至“误读”)的，它对新中国文论的知识体系建

构有何意义?

一、国际共运背景中的“西马东渐”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全球流变构成“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③的世界性图谱。“西马东渐”得以发生的基本历史契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一战后欧洲诸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相继失败，引发了这一地区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由此形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批判为要旨的批判理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或“市民”)的革命意识薄弱是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学院化的姿态相比，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革命实践的传统在俄苏和中国等其他地区得以延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正在寻求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大鼓励，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其中，俄苏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之一。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共享同一个思想资源，但是不同的社会土壤和形成的不

同问题意识,决定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同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俄苏和欧美又因二战、冷战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导致全球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复杂关系,如俄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两个马克思”之争、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在苏共二十大后对苏联教条模式的反思及批判以及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1960年代“中苏大论战”爆发,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西马东渐”时富有张力的思想背景。

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以俄苏为中介。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译本是直接对照“俄译本”进行翻译的,“俄译本”中“前言”表达的观点同时成为中国学者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评说标准。如1957年对列斐伏尔《美学概论》的翻译就是采用俄译本,在原书序言之前是苏联学者斯密尔诺娃撰写的俄译本序言,称该书“是法国进步力量为恢复和发扬法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而斗争的著作”。^⑤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并没有被正式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主要通过俄苏学者著述中的介绍有了初步的印象。此外,俄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扩散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因此一些看起来是直接译介匈牙利、东德等国著述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判断依旧是源自俄苏(如对卢卡奇的批判)。因此,“俄苏影响”成为新中国初期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形成了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接受的一道独特景观:在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学者往往引用苏联学者的观点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苏关系交恶时,中国学界则会间接借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苏联(称之为“苏修”)。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直接从俄苏以外其他国家进行译介。有的是直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产国进行翻译。如孙凤城翻译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导演说明》是选自《〈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注释本》(柏林汉舍尔出版社1958年版)^⑥、加洛蒂(旧译加罗第)撰写的《卡夫卡与布拉格的春天》一文选自《法兰西文学报》^⑦等。有的则

是通过他国进行转译。较为典型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内部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这些杂志译介了一些来自欧美、亚洲学者的论文、书评,其中的行文风格以及叙述方式相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激进批判话语缓和了很多,呈现出一种学术化的分析性。一般这些翻译的文章或资料汇编多会以“编者按”(或“出版说明”“编后记”等)的方式表明立场,说明翻译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供批判用”。提醒阅读者注意警惕其中“资产阶级思想”。例如,这一时期对存在主义美学特征进行系统化概括的一篇论文,就是译自美国学者撰写的一篇书评。^⑧第三种方式是在国际统战背景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学者的介绍和对欧美国家中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或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的欢迎。例如,葛兰西首先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杰出的革命领袖在中国宣传;萨特和波伏娃于1955年访问中国就是以“社会主义同路人”的身份得到邀请的;引发1959年“布莱希特热”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中国与东德建交十周年。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聚焦的时间段是“新中国初期”,但是“西马东渐”在此之前便已经发生。比如说,有学者考证中国早在1929年就已开始接受布莱希特。^⑨几乎与此同时,对卢卡奇的中国接受也开始了。如张斯伟于1930年翻译的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第六章《乔治·卢卡奇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卢卡奇和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⑩1930年代中期,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也展开了对卢卡奇的接受。^⑪1940年《艺风》杂志摘译了被视作为“反法西斯”作品的萨特的小说《墙》。^⑫

二、新中国初期“西马东渐”的学术地图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译介进入中国的时间为主线,以问题化的方式聚焦新中国初期中国学者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键文本及其引发的问题,我们可以粗略地绘制一幅“西马东渐”的学术地图^⑬:

时间 ^①	国籍	理论家	接受者/译者(译介单位)	关键文本	关键问题	接受形象 ^②
1929年— 1952年	德国	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黄佐临	《漫谈“戏剧观”》	“戏剧观”争鸣	现实主义大师
1930年— 1953年	匈牙利	卢卡奇 George Lukács	胡风 ^③	《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发展》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无关”批判	推崇批判现实主义的“老牌修正主义者”
1953年—	意大利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人民日报》	《意共奠基人葛兰西》	国际统战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
1940年— 1949年	法国	萨特 Jean-Paul Sartre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		社会主义同路人
1957年—	法国	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朱光潜	《美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	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1958年—	法国	加洛蒂 Goger Garaudy	罗大冈	《无边的现实主义》 ^④	“无边的现实主义”批判	贬低革命文艺的修正主义者
1958年—	法国	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西方哲学史组(编)	《存在主义哲学》	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批判	资产阶级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8年—	英国	考德威尔 Christopher Caudwell	朱光潜	《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	美的性质问题讨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1961年—	德国	弗洛姆 Erich Fromm	裘辉、涂纪亮(译) ^⑤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	德国哲学博士
1963年—	奥地利	费歇尔 Ernest Fischer	郑克鲁(译)	《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	“无边的现实主义”批判	修正主义者
1963年—	德国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郑克鲁(译)	《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	艺术家与再现问题	现代德国文艺批评家
1963年—	南斯拉夫	弗兰尼茨基 ^⑥ Predrag Vranicki	胡文建等(译) ^⑦	《马克思主义史》	“内部参考”材料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63年—	波兰	沙夫 Adam Schaff	林波等(译) ^⑧	《人的哲学》	人道主义问题的“内部参考”材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1963年—	德国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刘磊(译)	《社会民主党文献和资产阶级文献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阐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本化阐释批判	歪曲马克思主义者
1963年—	德国	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63年—	德国	布洛赫 Ernst Bloch				

布莱希特对新中国初期的戏剧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布莱希特的文学作品、戏剧理论呈零星化状态在中国传播,^⑨在1959年中国与东德建交十周年背景下形成“布莱希特热”。布莱希特的一些诗作和戏剧汇编成《布莱希特选集》出

版;^⑩同年,黄佐临撰文《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布莱希特的创作经历、戏剧理论。文中提出“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不到家,可能产生自然主义倾向;学习民族戏曲传统倘只发展加锣鼓点、说白韵,最好也好不过传统戏曲,这使

我想到布莱希特,从他这里是否可能得到启发?”^④这一言论,显示黄佐临已在思考用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突破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束缚问题了。1962年,黄佐临在《漫谈“戏剧观”》一文更进一步集中强调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提出用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激活中国“写意”戏剧观,完成中国戏剧辩证化、日常化改造。^⑤围绕“戏剧观”问题学界展开激烈讨论,布莱希特研究借助此次讨论不断深化。其实,黄佐临的阐释是极具策略性的,因为他挑战的对象是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间离效果”则具有强调形式的表现主义倾向。他一方面利用了布莱希特“现实主义大师”的身份,声称“布莱希特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艺术肯定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重形式的戏剧方式可以使中国戏剧的“写意”传统得到延续。^⑥

与布莱希特在中国所受到的正面接受不同,卢卡奇在新中国初期一直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其中原因有四:(1)卢卡奇、里夫希茨的“潮流派”引发俄苏文艺界批判相关信息传入中国,相应地,中国也将卢卡奇及其支持者们定义为“一个狭隘的、有害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相对立的宗派集团”^⑦;(2)胡风曾表示过对卢卡奇理论的支持,因而,新中国初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相应地牵连到了卢卡奇;(3)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卢卡奇正在担任“反革命”的纳吉政府文化部部长,因而再次作为“修正主义”批判对象;(4)1960年中苏大论战爆发,在对“国际修正主义”展开批判的过程中,也将卢卡奇牵涉其中。不过,正是这些此起彼伏的批判让卢卡奇的著作得以更多地以“供批判用”的方式被译介到中国。在1960年出版的《有关修正主义者卢卡契资料索引》^⑧中,不仅简要列举了卢卡奇英、德、俄、中四种语言发行的主要论文、专著,也将卢卡奇理论划分为哲学、政治·社会、美学、文学四大领域,这间接说明1960年代的卢卡奇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体系性,同时也呈现出初步的世界性视野。从文论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批判卢卡奇的焦点问题。1964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世界观与

创作方法的关系”一节中引用了卢卡奇的《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发展》一文,指出卢卡奇宣传的“世界观对创作方法不起作用的荒谬结论”。因为卢卡奇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为例宣称“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中的反动特性,并不妨碍他们用概括的、正确的和客观的方法去描绘社会现实”。^⑨这种宣传世界观与创作无关的理论显然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相冲突的。因此,对卢卡奇的批判可以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确立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新中国初期也对葛兰西做了一定程度的译介,但是葛兰西文论和美学方面的思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他更多被视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进行党史或生平传记的介绍。^⑩1957年在纪念葛兰西殉难二十周年的背景下^⑪,《人民日报》发表《意共奠基人葛兰西》一文介绍了《狱中札记》,称葛兰西“提出了关于意大利历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狱中札记’和他的‘狱中通信’具有巨大的理论教育和文学意义”^⑫。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弗兰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中对葛兰西的论述已经初步显示出问题化意识。他简要展现了葛兰西在政治、哲学、文艺等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对葛兰西的文艺思想进行高度评价。^⑬通过对俄苏及东欧国家对葛兰西的政治和哲学的译介,中国学界初步了解到葛兰西的“主要著作收在《狱中札记》”“葛兰西主要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还研究过美学、社会学、哲学史等”^⑭,等等。

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萨特在1950年代初期政治主张上逐渐显示出共产主义倾向,成为“社会主义同路人”;1954年萨特与其伴侣波伏娃受邀对苏联进行了访问;次年受中国政府之邀开启中国之行。这次中国之行之后,萨特写下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该文发表于1955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谈论了新中国建设、文字改革、作家思想改造等现实问题。^⑮不过,正如柳鸣九所指出的,萨特是当时“国际统战的对象”,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还“保持怀疑、警惕”。^⑯因此萨特的身份象征意义(自觉向社会主义看齐的“进步案例”)大于存在主义哲学家

形象,如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就认为,萨特“脱离了他们原来的流派,而被融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阵营里来”,是因为萨特是“人道主义者”“他们毕竟是热爱人,热爱生活的”^⑤。新中国初期对萨特的译介已涉及其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多个方面。^⑥与此同时,萨特是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引发了争议,如有学者就认为萨特是“借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资产阶级的观点”^⑦。

现在因空间理论而享誉中国的列斐伏尔其实在新中国初期也曾受到过密切关注。1957年,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作为美学大讨论中的西方知识补充进来。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该书的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资源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标志新中国初期已经开启了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接受。朱光潜在1957年一篇论文中就引用了列斐伏尔《美学概论》中的相关内容^⑧,并在1960年发表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中正式引入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美学思想。^⑨当然,依据这一线索,列斐伏尔对朱光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待进一步考察。^⑩列斐伏尔提出的对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化倾向进行反思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理论通过俄苏学者的批判文章也被译介进入中国。^⑪

1958年中国学者译介的关于加洛蒂的两篇文章《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⑫《法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派别》^⑬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加洛蒂对中国文论和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于1963年出版。这本“修正主义”著作引起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批判。但是中国学界的反响不是十分强烈,只有罗大冈的一篇论文以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译介关于“无边的现实主义”文章前所加的编者按对其进行了批判^⑭。“无边的现实主义”重点在于“无边”。加洛蒂试图对现实主义进行扩容,融入现代主义等艺术技巧来激活业已教条化的现实主义。其二,是加洛蒂对“异化”的阐释。加洛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以“论异化”开

篇,将马克思主义建基于“人”的基础上,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倾向,也使中国学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及其哲学价值有所了解。^⑮在对“无边的现实主义”进行译介的过程中,与其相类似的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费歇尔的一些关于现实主义论述也被译介进入中国。费歇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原文译“乔埃斯”)表现的“新现实”是富有艺术性的,“艺术作品不是现实的片段,然而,作为艺术作品,它是一种新的现实,作为一部杰作,它比现实本身有更多的现实”。^⑯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一文中,费歇尔引用了本雅明的一段评论,来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家历史自觉的丧失,艺术再现成为怀疑的对象。^⑰

通过加洛蒂对法国资产阶级主要哲学流派的批判文章,中国学者也初步了解到了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哲学及其代表作《知觉现象学》。^⑱如果说对萨特的理论因存在国际统战的缘故而态度略微缓和,那么对梅洛·庞蒂的批判则体现了新中国初期对存在主义这一“现代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基本态度。尽管这一时期梅洛·庞蒂相关艺术美学理论也有了译介^⑲,但国内学界对其译介的重点还是在哲学层面。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写的《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中,收录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和《辩证法的历险》相关节选片段。值得重视的是,《辩证法的历险》一书摘译的第二章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中高度评价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⑳从这个角度上说,新中国初期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有了一定了解。

新中国初期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出比较积极的关注态度。^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新中国初期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或者与俄苏学界保持态度一致,或者是对东欧修正主义的批判。区别于现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㉒,新中国初期并没有将东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整体来看待。这一时期有两本来自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译介值得注意。一是弗

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该书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直叙述到20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这种谱系化的建构打破了苏联教科书影响下的单线条、敌我对立的叙述模式，对中国学者从世界范围内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着重要意义。^⑤另一本书是沙夫撰写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该书是对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借助存在主义哲学系统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⑥

在译介苏联学者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的过程中，一些被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间接地进入中国。1963年内部发行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书摘录了苏联学者列·巴日特诺夫的文章《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此文强烈批判了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歪曲”，其中的典型人物包括马尔库塞和布洛赫(阿多诺也被简单提及)。巴日特诺夫批判马尔库塞在《论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手稿》一文放弃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而将其“描绘为伦理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布洛赫在《希望的原则》《主体—客体》一书中则更是将人进行抽象化理解，“企图从人的心理特性和情感推演出人类历史的全部运动”^⑦。这种看似“意外的收获”，其实契合了当时学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在同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人道主义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人道主义都有广泛的讨论”^⑧。在这种国际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问题（“文学是人学”等），“人道主义”成为与阶级性、党性相对立的概念。正是在对“供批判用”的资料译介中，弗洛姆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两篇论文也得到了中国学界关注。^⑨可以说，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得到系统化的认知，但是已经散点化地呈现在中国学界，这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先声。^⑩

三、“西马东渐”与新中国初期文论话语建构

本文对新中国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状

况的梳理其实是一种沿波讨源式的逆向追溯行为。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现在我们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知基础之上，回到新中国初期的文论思潮中来审视它的影响。正如冯宪光所说，“当时并没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独的学术流派来介绍和研究”^⑪。因此，在对新中国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旅行进行系统梳理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形态和问题意识，同时也要将其放在“新中国文论”的整体视域中进行考察^⑫，进而力求完整地呈现出新中国初期“西马东渐”的文论史意义。

首先，新中国初期的“西马东渐”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其一，译介多、研究少，而且这一译介有很多都是“二手译介”，即大多是在俄苏或东欧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论述中间接获得的；即便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原著的译介，也多是以单篇文章翻译或重要章节摘译的方式为主。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初期对布莱希特、卢卡奇等理论家有了一定研究，但是对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认识和了解还比较肤浅，也受到了认识上的局限。其二，重思想、轻文论。新中国初期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介绍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思想角度进行的，与文论和美学相关的问题还没引起重视。正是这种偏向于思想立场上的译介，使得这一时期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就认为布洛赫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明显地倾向于马克思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思想”，^⑬而苏联学者则称“布洛赫的哲学观点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完全不相容的”。^⑭其三，受中苏关系影响较大。新中国初期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受中苏关系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中苏大论战正式爆发后，中国学界对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态度上显得缓和了许多，这种微妙的变化，可以从“编者按”的形式中管窥一斑。加洛蒂《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一书的《出版者说明》中，仅仅是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一个

简要的概括,编写者的立场也收藏了许多,只是在文末加了一句,“现在,把这几篇文章集印成册,供内部参考”^⑥。沙夫《人的哲学》一书中《出版者说明》中,指出“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个人问题的研究……而在波兰,由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错误和过失,‘危机’显得更加严重……”^⑦。《出版者说明》中依旧没有进行严厉批判,仅仅是概括了文章的大致内容和该书的国际社会影响。这种“立场隐去”“引号频繁”的写作形式,或许就是一种隐晦的立场表达,同这一时期展开的较为激进的“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相比,更显示出其中意味。

其次,新中国初期“西马东渐”已部分参与新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尽管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总体处于一种被批判的态势,但正是这种“批判性接受”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卢卡奇。1960年代初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写的一套《文学概论学习资料》中,全书上、中、下三册一共分为十四个专题,其中《文艺与政治》《创作方法》《文学发展中的继承革新和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文艺的欣赏和批评》《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五个专题中都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卢卡奇的文章。^⑧多面向的收录一方面显示出卢卡奇作为“国际修正主义”的典型性,同时也折射出卢卡奇理论参与的广泛性。卢卡奇与布莱希特以及加洛蒂的现实主义的论争,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主义诗学问题上的新思考。这些理论明显有别于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延续到‘文革’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对当代文学、文艺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⑨因此,将卢卡奇狭义化理解为批判现实主义和对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批判,不妨理解为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对所谓对立性理论形态的设定;而对布莱希特的肯定和借鉴则是在戏剧表演领域对教条化的现实主义的突围。较为遗憾的是列斐伏尔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当时学界没有引起深入研究,也未

能参与新中国文论话语中的“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理论的讨论之中。

第三,新中国初期的“西马东渐”为新时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规模译介做了相应的准备。现实主义诗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释以及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存在主义美学是新中国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中比较重要的理论遗产。这也成为新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声。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一至四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分别是:“恢复我国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1978)、“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人性和人道主义”(1980)、“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规律”(1981)、“《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思想”(1982年)。^⑩不难看出,这些议题或是对新中国初期理论问题的反思,或是对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其中关于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手稿”的讨论已经开启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大门。另一方面,1980年代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出版,在中国学界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建构体系。全书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理论,也将俄苏马克思主义知识纳入其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更为重要的是将一些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知识化呈现,如“卢卡奇与文学形式”“戈德曼与遗传结构主义”“皮埃尔·马舍雷与‘离心’形式”“瓦尔特·本雅明”“贝托尔·布莱希特与‘史诗’剧”等。^⑪1979年,黄佐临和陈颢导演的《伽利略传》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布莱希特及其现代主义戏剧在中国迎来了第三次热潮。^⑫《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的出版使得卢卡奇研究不断深化,^⑬“卢布之争”也在198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中获得关注。新中国初期没有引起重视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成为新时期实践美学建构的理论支柱。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马文论、美学知识建构在具体理论文本上也部分存在与新中国初期译介文本对话的关系。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对西马知识中国建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⑭一书中,费歇尔、列斐伏尔的一些文章都直接参考了新中国初期的译本^⑮;有的论文虽然是80年代第一次被译

介进入中国,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是对新中国初期一些文本的回应^⑤。因此,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大规模译介,是在新中国初期的译介的基础上的拓展。卢卡奇、布莱希特、萨特等理论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着过渡的中介作用。伴随着对西学译介视野的扩大,中国学界获得了更为全面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思想的整体了解和系统研究。

正如有学者以西方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部发行”现象所讨论到的,“这种在中国与欧美及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错而并行的文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正印证着‘红色的60年代’作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的存在”。^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旅行,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域外文论的密切联系,也预示着尽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呈现强弱不均的问题,但是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中国”。无可否认,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在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语境中引发了一些误读,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这一接受现象构成了新中国初期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论话语建设的内在联系,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21世纪新时代不断推进“新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注释:

①“西方同行”一语来自刘康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李辉、杨建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③[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文贵中、魏章玲译,高钰校,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

⑤[苏]斯密尔诺娃:“俄译本序”,[法]列斐伏尔:《美学概论》,杨成寅、姚岳山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⑥[德]贝托特·布莱希特:《〈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导演说明》,孙凤城译,叶逢植校,《戏剧理论译文集》第9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版。

⑦[法]加罗第:《卡夫卡与布拉格的春天》,张英伦、郑克鲁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3年第3期。

⑧[美]魏克:《一种存在主义美学:沙特和梅劳-庞蒂的学说》,仲清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期。

⑨俞仪方:《布莱希特研究在中国:1929-1998》,《德国研究》1998年第4期。

⑩[苏]德波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张斯伟译,乐群书店,1930年版。德波林即苏联哲学家阿布拉姆·莫伊谢耶维奇·德波林,关于他的具体信息可以参考《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⑪如1935年4月《译文》2卷第2期上刊发孟十还翻译的《左拉与现实主义》;1936年《小说家》第1、2期连载刊发了胡风翻译的《小说与本质》;1938年以群翻译的《小说》经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1946年吕荧翻译的《叙述与描写》经新新出版社出版发行。

⑫[法]J.P. 沙特:《三个被处死的人》,《艺风》1940年第3期。这篇文章是萨特作品《墙》部分内容的选译。

⑬学术地图中“时间”是指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材料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早译介进入中国的时间。“接受者”主要是指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国学者;限于一些文本仅仅是译介而缺乏相应的阐释,故只标出相应的“译者”或“译介单位”。表格试图保持“接受者/译者(译介单位)”与“关键文本”“关键问题”“接受形象”的一致性,因此选取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文本进行解读,以便突出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时的问题意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理论家引起的“关键问题”要滞后于最初译介进入中国的时间。

⑭布莱希特、卢卡奇、萨特三位理论家进入中国的时间标注两个时间点,以区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间段的接受。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材料,分别将卢卡奇、布莱希特、萨特在新中国初期的接受时间定义在1953年、1952年和1949年:①1953年何其芳批判胡风时称胡风“把卢卡契和弗里契的庸俗唯物论的见解当作经典”(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文艺报》1953年2月15日)。②1952年《保卫和平》杂志发表了布莱希特的诗歌《和平》(《保卫和平》1952年第10期)。③1949年铁马《文艺斗争》一书中《存在主义》一节介绍了萨特(铁马:《文艺斗争》,正风出版社,1949年版,第22-24页)。

⑮一些理论家其实在这一时期不止一个身份。例如萨特就兼有“社会主义同路人”和“资产阶级存在主义哲学家”两个身份;列斐伏尔在美学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但是在文论领域则被视为“修正主义”;在对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的概念》的译介中介绍其身份是“德国哲学博士”，同时这一时期在心理学领域将其归入“新弗洛伊德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学派的人格（个性）理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11期）。学术地图中所列的身份是笔者认为与“关键问题”契合的身份。通过身份的梳理，可以看出两个问题：①由于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系统地认知，学科差异导致同一理论家身份不止一个，甚至前后出现矛盾；②一些学者则直接以职位、职务规定其身份，这反映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中的政治性，也体现中国学者认知层面的局限性，因而无法确定其核心学术身份归属。

⑩严格来说，新中国初期胡风已经退出了对卢卡奇的接受。但是，文艺界对胡风的批判中使得卢卡奇也成为“较为知名”的“修正主义”，这是卢卡奇在中国接受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将胡风列入其中。参考李希凡、蓝翎《胡风在文学传统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民日报》1955年2月1日）、王元化《“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人民日报》1955年3月29日）、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人民日报》1955年4月1日）。

⑪该书完整版在1986年由吴岳添翻译出版，即《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1960年代《现代文艺理论译丛》选译了该书的序言、后记等部分。详细文献信息请参考下文关于加洛蒂的论述。

⑫这一时期对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一书是选译，裘辉翻译了第四章《人的本性》，涂纪亮翻译了第五章《异化》。参考《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⑬弗兰尼茨基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通过其专著《马克思主义史》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发展流变有了系统性的认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通过此书进入中国，故将其列入学术地图中。

⑭关于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的译者信息和译介经过，可以参考胡文建文章《“灰皮书”的二十年与我和同事们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该文收录于郑异凡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一书（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76-85页）。

⑮沙夫：《人的哲学》，译者有四人，分别是林波、徐懋庸、段薇杰、张振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⑯1952年《保卫和平》杂志发表了布莱希特的诗歌《和平》（《保卫和平》1952年第10期）。1955年《光明日报》在布莱希特去世三天后发文《悼德国杰出的作家布莱希特》（黄贤俊撰，《光明日报》1956年8月17日）。1958年戏剧理论译文集第五辑《角色的创造》中发表了文章《介绍布莱希特》以及布莱希特

的三篇理论文章《戏剧小工具》《剧场随感录》《〈戏剧辩证法〉理论小品选辑》《角色的创造》，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第73-112页）。1958年《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现代部分）》第三编《现代德国文学》专章介绍布莱希特（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现代部分·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87-521页）。

⑰[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选集》，冯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⑱黄佐临：《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前的讲话》，《我与写意戏剧观佐临从艺六十年文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173页。

⑲佐临：《漫谈“戏剧观”——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62年4月25日。该文署名“佐临”，即黄佐临本人，后该文收入其文选，参见黄佐临《我与写意戏剧观佐临从艺六十年文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283页。

⑳其实，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主导下，如何评价布莱希特的戏剧确实是一个难题，苏联学者则发明了术语“左翼表现主义”（区别于非理性、个人化的“右翼表现主义”）表示对布莱希特的肯定，“在德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很多东西和表现主义左翼的创作是联系着的。布莱希特主观上不愿接受表现主义，但是，他的创作与表现主义的客观关系中，我们可以看见的不仅是继承中的断裂，而且是明显地把他们联系起来的虚线”（[苏]H·巴甫洛娃：《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7-136页）。

㉑戈宝权：《文学的人民性·译者序》。[苏]顾尔希坦：《文学的人民性》，戈宝权译，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版，第1-7页。戈宝权在《译者序》中详细地介绍了围绕“潮流派”苏联批判卢卡奇的始末。

㉒《有关修正主义者卢卡契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料室，1960年版。（本书由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料室编写，未出版发行，因此没有出版社信息）。

㉓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241页。

㉔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意大利共产党简史》（陆人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该书是陆人根据俄译本译出，《俄译本出版者说明》中称“本书是集体的简明党史读物”，因此俄译本作者并未标出。）、[意]隆巴尔多·拉第斯、卡尔朋的《葛兰西的生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手册》（该书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编印,封面标有“内部资料,注意保密”字样,没有出版社信息。),第83-84页词条“安东尼奥·葛兰西”等。

⑳《意大利人民举行集会纪念葛兰西殉难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57年4月30日。(这是一则通讯,原文标有“新华社29日讯”。)

㉑胡真、刘戎:《意共奠基人葛兰西》,《人民日报》1957年4月30日。

㉒[南]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下),徐致敬、胡文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02-415页,第527页。

㉓《哲学研究》编辑部:《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1页。

㉔曾军:《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㉕柳鸣九:《柳鸣九文集》(卷三),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第553页。

㉖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㉗存在主义哲学译介的代表书目有:[法]让·华尔专著《存在主义简史》(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著《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存在主义文学译介代表书目有:《厌恶及其他》(郑永慧译,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存在主义文论的书目有:[爱]邵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沙特》,舟斋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1961年第6期;[美]魏克:《一种存在主义美学:沙特和梅劳-庞蒂的学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1964年第1期。

㉘参见《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关于实践的集合体的理论》一书的《译者前言》iii页。[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关于实践的集合体的理论》,徐懋庸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㉙朱光潜原文中使用的是该书的原名《美学贡献》(CONTRIBUTION A L'ESTHETIQUE)。在注释中他这样写道:“亨利·列斐伏尔:‘美学贡献’,已由杨成寅和姚岳山从俄译本中译出,改称‘美学概论’,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这里的译文是引者由法文原文译出的。”参考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

㉚夏中义:《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为人物表》,《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㉛“美学大讨论”期间朱光潜也译介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考德威尔的论文《论美——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研究》(原文发表于《译文》1958年第5期),并撰写了《关于考德威尔的

《论美》》(原文发表于《译文》1958年第5期)一文。朱光潜译介考德威尔的论文,主要是因为考德威尔(“英国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文艺理论家”)关于美的看法与其提出的“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有相似性,体现出一种资源化的征用。参考《朱光潜全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㉜[苏]IO·波列夫:《反对美学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苏]M·赫拉普钦科等著:《世界观和创作》,戈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224页。

㉝[法]罗·加罗迪:《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157页。

㉞[法]R·加罗第:《法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派别》,哲学研究编辑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0-311页。

㉟罗大冈:《“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无耻的“现实主义”——评加罗迪近著〈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委会)刊发的系列文章包括:《〈无边的现实主义〉序》(1964年第1期)、《一种摆脱了教条的美学——评罗歇·加罗第的〈无边的现实主义〉》(1964年第1期);《〈无边的现实主义〉代后记》(1964年第6期);《关于现实主义及其边界的思想》(1965年第1期)、《莫斯科演说》(1965年第4期);《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1965年第5期);《论现实主义及其边界》(1965年第5期)。

㊱[法]加罗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刘若水、惊蛰译,陈友松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㊲[奥]艾伦斯特·费歇尔:《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郑克鲁译,丁世中校,《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3年第1期。

㊳原书翻译为“华尔特·本雅明”,译者郑克鲁在其注释中写道,“华尔特·本雅明(一八九二——一九四四),现代德国文艺批评家”(参考《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一文)。这里对本雅明卒年时间书写有误,本雅明卒于1940年。

㊴[法]R·加罗第:《法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派别》,哲学研究编辑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0-311页。

㊵[法]梅劳-庞蒂:《眼和心》,戴修人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1期。

㊶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㊷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美学问题译丛1960-1962》(《哲学译丛》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一书的附录中看出。该书《附录》中罗列了两份美学论文目录,分别是“社会主义国

家主要哲学杂志美学论文目录(选译)(1960-1962)”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哲学杂志美学论文目录(选译)(1960-1962)”。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哲学杂志美学论文目录(选译)(1960-1962)”中,除苏联以外,选录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六国相关美学论文标题。

⑤4参考衣俊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傅其林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等。

⑤5[南]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徐致敬、胡文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⑤6[波]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林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⑤7[苏]列·巴日特诺夫:《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秦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2页、第93页。

⑤8参考《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出版说明》,《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⑤9弗洛姆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人的本性》《异化》,它们分别是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的第四章、第五章。参考《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⑥0一方面,1981年苏联学者列·巴日特诺夫研究《手稿》的专著《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完整版译介进入中国(新中国初期摘译的《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一文就是该书的第一章内容)。另一方面,上述提及的被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在1983年出版的两本《手稿》研究论文集中都出现了完整版,参考《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1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在中国》,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⑥2曾军:《“新中国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七十年的一种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⑥3参考“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出版者说明”。[法]加罗蒂:《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版。

⑥4参考“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出版者说明”,[波]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林波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⑥5《文学概论学习资料》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写的一套三卷本的资料汇编,上册出版于1961年,中册、下册出版于1962年。

⑥6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⑥7吴介民:《回顾与前瞻——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四次学术讨论会情况概述》,《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396页。

⑥8[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⑥9《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准备上演〈伽利略传〉》,《人民戏剧》1979年第1期。(该文是一则简讯。)

⑦0[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⑦1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⑦2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中收录的费歇尔的三篇论文《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郑克鲁译、丁世中校)、《艺术与思想的上层建筑》(柯农译)、《上升与没落之间》(叶廷芳译)分别发表在《现代文艺理论译丛》杂志的1963年第1期、1964年第3期和1964年第6期。收录列斐伏尔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一文则是《美学概论》的第二章,编者就该文注释道,“原书出版于1953年(巴黎版),1954年译成俄文,该书前一、二章中译文最初刊于《学习译丛》杂志;1957年出版中译本,后来该书二、三、四、五共四章收入《勒斐伏尔文艺论文选》(1965年,作家出版社)”。(《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第387页)这种细致的文献考证,不妨视为20世纪80年代编者对新中国初期理论文本重视的一个生动案例。此外,在朱立元、陆扬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2卷回归存在之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收录的梅洛·庞蒂《眼和心》一文,对比之下可以发现是戴修人在1960年代的译文(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1期)。

⑦3例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中新译了列斐伏尔《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一文,编者专门就此文注释道,“在法国,此文开了否定社会主义之先河,发表以后曾遭到批评。可参考《世界观和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的有关文章”。(参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第417页)

⑦4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